

美国《商业周刊》

畅销书

★ ★ ★

25 COURSES DEDICATED TO
BUSINESS LEADERS

WINSTON CHURCHILL, CEO

献给商业领袖的 25项课程

——CEO温斯顿·丘吉尔

艾伦·阿克塞尔罗德 [著] 吴修华 杨耿业 [译]



永不退却，永不退却，永不，永不，永不，
永不——无论事情大小、轻重，除了出于对荣誉
和理智判断的坚持外，不要屈服于任何事物。

——美国《书评专页》

广东省出版集团
广东经济出版社

美国《商业周刊》

畅销书

★ ★ ★

25 COURSES DEDICATED TO
BUSINESS LEADERS
WINSTON CHURCHILL, CEO

献给商业领袖的 25项课程

——CEO温斯顿·丘吉尔

艾伦·阿克塞尔罗德[著] 吴修华 杨耿业[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献给商业领袖的 25 项课程: CEO 温斯顿·丘吉尔 / (美) 艾伦·阿克塞尔罗德著; 吴修华, 杨耿业译. —广州: 广东经济出版社, 2013. 12

ISBN 978-7-5454-2929-9

I. ① 献… II. ① 阿… ② 吴… ③ 杨… III. ① 丘吉尔, W. L. S. (1874~1965) —传记 IV. ① K835.61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68615 号

All rights reserved including the right of reproduction in whole or in part in any form. 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Prentice Hall Press, a member of Penguin Group (USA) Inc.

版权登记号: 图字: 19-2009-043

出版发行	广东经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11~12 楼)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广州佳达彩印有限公司 (广州市黄埔区茅岗环村路 238 号)
开本	730 毫米×1020 毫米 1/16
印张	16.75 1 插页
字数	232 000 字
版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
书号	ISBN 978-7-5454-2929-9
定价	3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发行部地址: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11 楼

电话: (020) 38306055 38306107 邮政编码: 510075

邮购地址: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11 楼

电话: (020) 37601950 营销网址: <http://www.gebook.com>

广东经济出版社新浪官方微博: <http://e.weibo.com/gebook>

广东经济出版社常年法律顾问: 何剑桥律师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内容简介

“我也希望，有时候我能建议狮子把它的爪子用在正确的地方。”

1954 年 11 月 30 日

威斯敏斯特大厅

丘吉尔在其 80 岁生日时在议会发表的演讲

温斯顿·丘吉尔拥有吸取失败的教训并将其转化为成功的罕见能力。在希望看似渺茫时，别人看到的是失败和灾难，而丘吉尔看到的却是机遇，并且以无畏的远见和自信在机遇溜走之前迅速而果敢地加以把握。最为难得的是，他拥有激励他人的本领：以语言传达目标，不仅让人信服，而且振奋人心。丘吉尔对风险的判断非常敏锐，在危机的重压之下无比冷静，是一位最为无畏的 CEO。

不过，那些大大小小的商业组织的领导者能够从温斯顿·丘吉尔的事例中学以致用吗？畅销商业书刊作者艾伦·阿克塞尔罗德在书中令人叹服地展示了丘吉尔领导艺术的魅力，不论其植根于任何地方。从作为一名不合格学生的早年时期到在印度和南非所经历的战火洗礼，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第一次任职政府的海军大臣这一不幸职位到他的在野岁月，丘吉尔从未曾对他自己和他的命运失去过信心。当某个命运出现时，他已做好了准备，不仅迎接它，而且毫不犹豫地拥抱它。

从历史原始素材的角度来说，阿克塞尔罗德挖掘的是纯金：二十五



个章节详解了丘吉尔如何成为杰出的拉拉队长、战略家、战术家、沟通者、管理者以及形成其他的领导风格。阿克塞尔罗德以他惯常的标志性风格表达了他的见解，并通过引用来自丘吉尔生平的生动语录和场景，让这些见解更显丰满。任何渴望成为领导者的人都将 从这些课程中获益匪浅。



温斯顿·丘吉尔生平

终其一生，他最大的渴望和需求就是处于行动的中心。这个事实本身并不足以解释温斯顿·丘吉尔的行为，但是不了解这个事实就不能理解他的行为。温斯顿·丘吉尔于1874年11月30日出生在位于牛津郡伍德斯托克镇的布莱尼姆宫——丘吉尔家族无与伦比的庄园。他比预产期提前两个月出生，这很好地预示了一生都不安分的他将在这个世界留下一个又一个不可磨灭的印记。1898年，作为一个二十三岁的骑兵副官（少尉），温斯顿劝说英国兵部大臣赫瑞修·基奇纳勋爵同意让其参加尼罗河行动时，与他共事的初级军官都指责他“超级早熟”和“傲慢得让人不能忍受”。实际上，他远远不止这样。由于不满足于军营生涯，他还从战场前线发回关于英国殖民战争的新闻报道；他以第一手资料对发生在马拉坎德（如今巴基斯坦的国土）的普什图部落对抗英军的战争创作了《马拉坎德野战军纪实》（1898年），该书在他离开印度参加基奇纳的南非行动前不久出版后成为一本轰动世界的畅销书。图书评论家也称之“早熟”，但他们指的是这个词的最佳含义，因为这本书展示的是一个更为成熟作者的叙述技巧和历史权威。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作者在描述战场高级军官的行为时表现得仿佛他是他们的指挥官——显然，这并不能讨他所描绘的众多军官喜欢。

但是，他们的意见对温斯顿·丘吉尔并不重要。作为一个早产儿，他成长为一位早熟的历史学家和早熟的将军可以说很自然。

从表面上看，他在社会和政治上的人生起步较高。他的父亲、杰出的保守党派政治家伦道夫·丘吉尔勋爵是马尔博罗公爵一世和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1—1714年）的英雄约翰·丘吉尔的后裔。作为指挥官的马尔博罗，在布莱尼姆战役中为英国获得最重大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

劳，布莱尼姆宫是议会授予他的礼物。公爵一世的后代子孙马尔博罗公爵二世至六世完全没有祖辈的杰出成就，他们被普遍描述为挥霍无度的败家子，完全看不到任何复兴的迹象。马尔博罗公爵七世——温斯顿·丘吉尔的祖父成功恢复了家族的威望；他深受维多利亚女王的器重，但是他没能给这个家族带来多少物质财富。事实上，为了维持布莱尼姆宫的开支，他苦苦挣扎，不得不变卖其他房产、马尔博罗家族珠宝以及富丽堂皇的布莱尼姆图书馆——而这是温斯顿最为恼怒的一点。温斯顿的叔叔、马尔博罗公爵八世在 1886 年继续了这种贱卖行为，他以 35 万英镑（根据计算，这笔钱现在相当于 5000 万美元）一次性变卖了早期绘画大师的一系列精品杰作。不过，他同时恢复了丘吉尔家族挥霍的传统，因而，尽管得到了这笔钱以及在与一位美国女富翁的婚姻（在这之前是他与第一任妻子的离婚丑闻）中得到了财产，但是这个家族的财产还是在减少，后来留给公爵九世森尼的只有布莱尼姆宫和其他很少的财产。森尼也娶了一个非常富有的美国人（范德比尔特家族的一位女孩），但是后来与妻子离了婚，因而失去了分得她财产的机会。森尼在去世时已濒临破产。

温斯顿的父亲伦道夫·丘吉尔勋爵又娶了一个美国女富翁人——异常美丽的珍妮·杰罗姆，其父亲是一位纽约金融家和证券经纪人，他曾是《纽约时报》的股东之一并拥有很多赛马。在伦道夫勋爵身上，丘吉尔家族的两个高贵血统得以合并。一方面，他是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作为一名保守党政客，他却支持工人阶级；此外，他还是一个口若悬河的雄辩家。作为议会的一员，他被任命为印度事务部大臣，接着改任财政大臣，此职位除了类似于美国财政部长之外，更是当选更高职位的踏脚石。伦道夫勋爵极其缺乏耐性，这一点后来在他儿子的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由于不满足于按部就班地攀登至保守党领袖位置，他试图迫使索尔兹伯里侯爵把第一财政大臣之位让给他，这样他就可以在下届保守党政府中成为首相。但是，索尔兹伯里的立场很坚定，他自己在 1886 年的大选中成为首相，而伦道夫勋爵最后从财政大臣之位辞职，幻

想着能够推翻索尔兹伯里。他想依靠自己在议会中的声望来实现这一目标，但是，尽管伦道夫勋爵非常受议员们欢迎，却不足以在保守党员中煽动彻底的政变。索尔兹伯里紧紧保住他的职位，而伦道夫·丘吉尔勋爵在辞掉他的职务后，发现自己忽然成了一个无关紧要的局外人。

就这样，他很轻率地把自己的政治生涯丢弃了，但是这还不是最坏的情形。作为一位颇受尊敬的保守党政客，他同时也是一个很多人眼中的风流种子，这让他日后饱受痴呆症和三期梅毒所引起的神经错乱之痛苦。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倾向于把脑力衰退归因于性病，而现代的医学权威则认为伦道夫勋爵患脑肿瘤的可能性更大。不过，伦道夫的同僚、公众和他自己的家人——包括他自己——都认为他患的是梅毒，从而导致了曾经敏捷的思维极其急剧而痛苦地衰退。这个伟大的雄辩家变成了一个严重的口吃者，说话语无伦次、杂乱无章，仿佛他一直宿醉未醒。珍妮虽然在他们婚姻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欠忠贞，但却在他健康急剧恶化期间忠诚地守护在他身边。1894年，她带着他乘船旅行（维多利亚时代的人视旅行为极好的治疗方式），但是他的神经错乱病症继续恶化，并且在1895年1月24日——这对夫妇回到伦敦后不久去世。

“我所有与他共事——加入议会，并在他身边帮助他的梦想结束了。我别无选择，只能追求他的目标，平反他的过去。”

——《我的早年生活》，1930年

年轻的温斯顿·丘吉尔被英国的皇家军事院校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校所录取，在直至他父亲去世时的几个月时间里都在该校度过。他崇拜他的父亲，但是，他的性格决定了他从不将他的父亲理想化。他用自己的假想的感性思维来看待父亲，没有因为父亲生前的失意而将父亲视为失败的领导，反而把父亲当作本有可能成为的伟大领袖。在对他父亲的看法中，我们看到的不是幻觉，而是有根据的想象。温斯顿明白他的父亲是什么样的人；当从桑赫斯特赶回家参加葬礼时，他询问了其父亲最后一次生病的所有细节。在了解到他死于梅毒的恶化（人们当时这么认

为)时,温斯顿·丘吉尔并没有露出哪怕一丝的羞耻感。后来,他说起在其父亲葬礼上的感受时称,他现在有责任“把倒在被袭击后的战场上的破烂旗帜再次举起来”,他当时就决定在议会获取一个席位以追求他父亲未曾实现的目标和“平反他的过去”。

温斯顿·丘吉尔崇拜他美丽的母亲,他非常欣赏她在父亲病终前的最后几个月里对父亲的悉心照顾。作为子女和年轻人,就算他清楚他母亲对其丈夫的忠诚只是一时情感发作,她之前时常有不忠行为,他也不会让这些情况减少他对她的敬爱之情。更为难得的是,他似乎从不因为他母亲对自己漠不关心而有任何怨恨心理。她既不是一个轻易流露感情的母亲,也算不上一个有爱心的母亲;相反,她是一个冷漠的母亲。在这方面,伦道夫·丘吉尔勋爵也没有试图去获取他儿子的好感,更不用说崇拜了。他不仅对温斯顿冷淡,而且经常严厉批评这个年轻人,或许他在儿子身上看到了自己错误人生的影子。

“我的母亲同样给我的童年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对我来说,她就像是晚星一样闪亮;我非常爱她——但会从一定的远处。”

温斯顿·丘吉尔对他父母亲的失败绝不会视而不见。实际上,他是由他的保姆养大的。他把安妮·埃佛勒斯夫人亲昵地叫做“爱姆”,并从她那里获得了父母不曾给予的温暖和爱意。温斯顿很爱他的保姆。在为这个家庭服务了大约19年后,她被丘吉尔夫妇所抛弃,只能依靠微薄的养老金度日;温斯顿从他有限的津贴中尽可能地节省一些来支持她。他明白自己的父母对她不好,因而想把这个错误纠正过来。当她在伦道夫去世四个月后患了腹膜炎时,温斯顿马上来到她的床边,为她请了医生和私人护理,并在她临终前的几个小时里陪伴在她的身边。接着,温斯顿付了她的葬礼开支、安葬费、墓石费,甚至坟墓的永久维护费。他认为这些事情本来都是他母亲应该做的,但他从不谴责母亲的疏忽;反而,所有需要为他的保姆做而他能够做到的,他都自己去做了。



“我的保姆（埃佛勒斯夫人）是我的知己……是我最亲爱和最亲密的朋友。”

——《我的早年生活》（1930年）

至于父亲对他的苛刻，年轻的温斯顿似乎从未憎恨过，反而体谅父亲的良苦用心，因为他明白自己身上有很多地方应该受到斥责。他体弱多病而又顽皮任性，天资聪颖但无奈不能在纪律学习中有良好表现。丘吉尔家族的前面六代人都在伊顿公学读过预备学校，但是丘吉尔夫妇认为他们的儿子在那里会失败。于是，他们退而求其次，选择了哈罗公学；虽然它没有伊顿公学那么有名，但仍不免为一个尚可接受的第二选择。不过，根据温斯顿几年后在《我的早年生活》中所写，他被入学考试羞辱了：“我在考卷的上方写下我的名字。接着，我写下问题的题号‘1’。想了好久后，我在题号左右写下一个括号——‘（1）’。但是，在这之后我就不能想到任何与考试联系的相关或者正确的东西。”十三岁的温斯顿觉得这张纸本来是空白的，现在却“无端端地”出现了一个墨迹和几个污点。“我对着这份考卷足足看了两个小时，然后好心的监考员收起我那张书写纸，拿着它摆到校长的办公桌上。”最惨的是温斯顿·丘吉尔最后被哈罗公学录取了。他一定知道他不可能是因为他的考试成绩被录取的。

丘吉尔最令人不解的一点就是他是一个彻底失败的学生。的确，他在法语、古典语言和数学等科目的成绩不稳定，有时相当好，有时却不及格。历史一直是他喜爱的科目，他在该科目的成绩十分优异，但是历史却被认为是一个“辅修”科目。不过，他的教师更关注他平时的顽皮行为，而不是他的学术表现。他至少在三个学校活动中真正展现出了非凡的才华：击剑（他在学校公开锦标赛中获过奖）、吟诵（他曾单凭记忆朗诵了托马斯·巴宾顿·迈考雷所著的《古罗马方位》中几百行文章而又一次获过奖）和英文写作。不过，他却仍然被要求参加他自己后来所称的由一位名为罗伯特·萨默维尔举办的补习课程。就在参加常规和高级课程的男孩学习希腊语和拉丁语的时候，萨默维尔却在大部分时间

里传授英语，尤其重视写作。在温斯顿·丘吉尔看来，“深入他脑海的这些课堂”，他后来这样写道，形成了“英国人所说每一个普通句子的基本骨架，这让人很不可思议”。

到了十多岁时，温斯顿已经深深爱上了英语语言，对它的应用特别精通，尤其体现在“每一个普通句子”上。对英语语言的这种驾驭能力已经与他合为一体；与此同时，他感到了语言的高贵，它不是来自普通意义上的语言，而是来自他所说的语言，英国人民所说的语言。人们常说爱国主义——即对一个人的个人身份与其祖国的身份不可分割的认知——深深植根于语言。当一个贪婪帝国的走卒侵略一个国家时，除非该国的语言被消灭掉，要不然征服就不算彻底。随着侵略军进入一个地区，最严厉的规定就会出台，侵略者会强制要求被侵略区的人民说他们的语言，禁止使用本土语言，至少在公共场合禁止。从这层意义上说，温斯顿·丘吉尔在早年时期就从所阅读、书写或者说出的每一个文字中获得了自己的身份。他将其视为一种超越才智认识和单纯情感的民族认同感，是一种内在高贵的东西。因此，英国人是温斯顿·丘吉尔的第二性质。这是他的身份，给予他无限的满足感。

“（我在哈罗公学的同学）继续学习拉丁语和希腊语以及其他有趣的东西，但我学习的却是英语。在人们眼中，我们只是一群笨人，只能学习英语。”

——《我的早年生活》（1930年）

不过，英文写作的天赋和对祖国的热爱并不足以成就一番事业。在维多利亚后期的英国，从政有三个途径：驻外机构、国内行政部门、军队。这三个途径都要求在严格的入门考试中获得优异的成绩；在这一点上，甚至家族声望都不能让它们降低录取标准。驻外机构和国内行政部门均要求在一些科目上取得高分，而它们恰恰是温斯顿不乐意去掌握或者没有能力去精通的——古典学、外国语言和数学。这样，就只剩下军队一条路可走。



对于即将从哈罗公学毕业的温斯顿·丘吉尔来说，军队不失为一个有吸引力的选择。在孩童时期，他最为喜爱的消遣方式就是摆弄玩具战士。尽管他身体虚弱且经常患病，他却喜欢骑马和其他户外运动。他使用军刀的非凡能力仿佛与生俱来。因而，参军并加入皇家军队的军官团远比进入驻外机构或者国内行政机构可行；不过，仍然需要通过考试才行。温斯顿自以为不会有什么麻烦，但他几乎不合格，分数仅仅通过骑兵部队的录取分数线——该团的学术性要求比步兵、炮兵和工程兵要低。

他能考出这样的成绩有很好的理由：英国骑兵部队的录取标准之低人人皆知，因而伦道夫勋爵坚决反对加入骑兵部队，他坚持要求温斯顿再次报考，希望加入更受尊敬的步兵部队。他顺从地再次参加了考试，但这次他却失败了——甚至进不了骑兵部队。尽管伦道夫勋爵极少干涉他儿子的事务，但是这次他出手了，也许是出于愧疚，也许是出于父亲对儿子的失败而感到的羞耻。他为温斯顿找来了一位军队导师。这位军队导师成功地将足够的知识灌输到这个男孩的头脑中，让他在1893年6月顺利通过了桑赫斯特的录取考试。不过，这次温斯顿同样只能通过骑兵部队的录取分数线，而伦道夫勋爵此刻已病重，在责骂儿子令自己失望后，他无奈地接受了这个结果。

年轻的丘吉尔被桑赫斯特录取了，在104名新进学生中排名第95位。在该校完成训练后，他在所在毕业班级的130名学生中的排名提升至第20位。他在训练、体操、骑马和战术等项目的表现优异。尽管他的大幅进步本可以为他在步兵团第60步枪队获得一个职位，从而安抚一下他的父亲，但是温斯顿却选择了加入一个非常受欢迎的精英骑兵团——第四骠骑兵团。

“我曾长时间以为我的父亲凭他的经验和鉴别力能够察觉出我身上具有的军事才华。但是，我后来听说他的结论却是我不够聪明，当不了律师。”

——《我的早年生活》（1930年）

在1895年2月接受新任务后，在等待跟随军团去印度服役（英国任何一个职业军人都必须接受的例行要求）前，他通过操练和积极参加各种如马球和障碍马赛的剧烈运动打发时间。不过，温斯顿·丘吉尔对常规的事物都没有耐心。即将远赴印度的士官们在出发前都有一段很长的假期——毕竟他们必须在国外服役长达九年之久。丘吉尔副官决定在古巴度过这个假期，那里正在发生抵抗西班牙统治者的革命。他想为一家报纸报道这场战争，让自己置身战争中，尽可能地接近危险。

置身行动之中对丘吉尔来说永远是重要的。风险，甚至性命的危险，对于他就是一种馈赠。不过，他去古巴的决定却一点都不冲动，他不仅将它视为快速获取名誉的机会，而且将战地报道当作获取急需资金的捷径和进入公众视线的手段，从而为参加议会选举做准备。更重要的是，他没有简单地打包行李就出发，相反，他按照平时想要某样东西时的做法行事：确认哪些人拥有权力和职位，能够给予他想要的东西，然后他直接向他们提出请求。在出发前，丘吉尔说服他母亲去拜访她的朋友、英国驻西班牙大使，这位大使给了他一封致所有西班牙高层行政和军队官员的介绍信。接下来，他拜访了英国首席指挥官，从他那里正式获得了参加古巴战争的许可；然后他又拜访了英国军事情报局局长，得到了从古巴这个岛上收集情报的官方授权。到了1895年11月底，温斯顿·丘吉尔被编入参与古巴起义的西班牙部队。

有些人（虽然很少）喜欢被人持枪射击。1754年，乔治·华盛顿就发现自己是这么一个人。1754年5月31日，在他第一次参加枪战后，年轻的乔治·华盛顿从位于宾夕法尼亚大密都斯的营地中给他的同父异母弟弟约翰·奥古斯汀·华盛顿写信，他在信中宣称：“我以事实向你保证，我听到了子弹从耳边呼啸而过的声音；相信我吧，有一种魅力在其中。”

1896年，温斯顿·丘吉尔也发现自己是这么一个人。当他跟随部队游泳过河时，丘吉尔遭遇了一场小规模枪战。而后，他在发出的新闻报道中回味子弹飞过的声音：“有时像一声叹息，有时像哨子声，有时像



受攻击的大黄蜂发出的嗡嗡声……”另外，他给他母亲写信，说他“听到了很多子弹的呼啸声和嗡嗡声，足以让我满足一阵子”。

“一杯香槟给人一股兴奋的感觉：神经顿时绷紧，想象充分展开，才智变得更加敏捷。而一瓶香槟则会产生相反的效果。过度的酒精令人昏昏欲睡和麻木不仁。战争的原理一样。不论是美酒还是战争，唯有细细品尝方可发现他们的美妙。”

——《马拉坎德野战军纪实》（1898年）

在古巴的那段经历带给他的一大收获就是极度危险所带来的兴奋，或者正确地说，是它的滋味。另一个收获更加意义深远：一个意志极度坚强的民族所拥有的力量对我们的启示。官方上，丘吉尔被编入西班牙军队（一个帝国援助另一个帝国），但是他很快就开始钦佩古巴的起义军。古巴起义军极其擅长非正式的战争和游击战术——丘吉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正是运用这种战术获胜的：他用类似于“特别行动小组”和“亲墩特远征队”的形式分别在欧洲和缅甸赢得了胜利；另外，他们善于在逆境中浴火重生，仿佛是西班牙越想摧毁他们，他们就越能从中获得相应的力量。这个故事让我们明白有技巧的反抗具有多大的力量。

作为战地记者的丘吉尔在古巴获得了极大的赞誉，而后他回到他的军团。1897年春季，在家休假时，他收到了印度西北边境在开战的消息，他立即发了一份传真给负责指挥镇压马拉坎德（现巴基斯坦的一个地区）起义军的将军宾登·布拉德爵士，主动请缨参战。仿佛这个举动对一个低级军官来说还不够草率，丘吉尔甚至等不到布拉德的答复就行动了。他登上了第一艘去孟买的船，在到了该市后他才收到布拉德的答复。“没有空位。”信中这样开头，但它接着写道：“你以记者的身份去。我会尽量把你编入部队中。布拉德。”

这样，丘吉尔加入了马坎拉德野战军。在行军的每一天，他都发三百字的报道到印度阿拉哈巴德的《先锋报》，并为伦敦的《每日电讯报》写一系列稿酬颇高的专栏文章（这要归功于他母亲的影响力）。他不仅

仅写文章。1897年9月16日，他的部队在西北边境的崎岖山道中遭到了普什图部落军队的攻击，伤亡惨重，差点全军覆没。和其他时候一样，丘吉尔当时行军在大队伍的前边，他和另外四位士官以及八十名印度锡克教徒被围堵在一个危机重重的小村庄里。作为一名士官，丘吉尔只带了一个随身武器。然而，在这种敌众我寡的情况下，他从一名受伤的锡克教徒手上拿过一把李-恩菲尔德步枪，坚定地向来攻的普什图人开火，试图把他们赶走。不料，锡克教徒一众却另有打算，他们开始撤退，很快就变成了大溃败。随着他身边的“部队”一溃而散，丘吉尔没办法，只能骑着他灰色的战马一起逃跑；不过，他坚称他“坚持到了最后”。

正如前面所说，丘吉尔所著的关于亲身随军经历的书《马拉坎德野战军纪实》非常畅销。这让他更加迫切想走到下一个聚焦点，即埃及、苏丹边境地区。那些高级军官对丘吉尔著作中所体现的“不敬”大吃一惊，故而无视了他跟随基钦纳到北非的请求。不过，索尔兹伯里首相非常喜欢《马拉坎德野战军纪实》这本书。他把丘吉尔召到唐宁街10号，毫不掩饰对他的欣赏，并问自己可以为他做些什么。当丘吉尔开心地表示他想参加埃及的任务时，索尔兹伯里马上致信英国驻开罗的代表。幸运的是，第21枪骑兵团刚好有个空缺。基钦纳一向对像丘吉尔这类人的来来往往不过问，故而没有反对。这样，年轻士官乘船前往开罗，因为太急于上岸，他竟忘了通知他的上司他被调出第四骠骑兵团的事。

1898年9月2日，丘吉尔参与基钦纳尼罗河部队的任务出现了高潮——在苏丹喀土穆三英里以外发生了乌姆杜尔曼战役。那天，四万名来势汹汹的托钵僧队伍突然袭击他和这支二万六千人的英埃联军。尽管人数上出现明显的劣势，但是基钦纳手下的士兵却拥有现代的弹匣步枪、机关枪和大炮。他们坚守着阵地，不断扫射来犯的托钵僧。到了第二天早上九点，他们赢得了战役的胜利，并刚好避开了一天最热的时候。行事谨慎的基钦纳勋爵决心不让被击败的敌人有重整旗鼓的机会，因而，在战斗临近结束的时候，他命令第21枪骑兵团去消灭残留的敌人，清理战场，而第21枪骑兵团只有300多名骑兵。接到基钦纳的命令后，他们



硬着头皮去追捕仍然在逃的 3000 名托钵僧。一般情况下，骑兵士官会用军刀来对付敌人，但丘吉尔用的却是他的毛瑟手枪。他宣称自己用这把手枪杀死了六名托钵僧——三人“肯定”被杀死，两人“可能”被杀死，而一人“不确定”是否被杀死。

和他在对付普什图人时一样，他在前线作战，差点被杀死。300 多名战士的骑兵团，21 人牺牲，49 人受伤。另外，该军团的一半战马在战斗中倒下。这就是完成一项使命的代价。敌人或被杀或逃散，彻底被击败。

“历史上，很多重大决斗都以意志力强大者胜出而告终，即使机会多么渺茫，差距多么微小。”

——1941 年 6 月 25 日对下议院发表的演讲

当时，温斯顿·丘吉尔也失去了对军营生活的热情。1899 年年初，在基钦纳的尼罗河战役正式结束后，他辞去了军职，回到英国，撰写他的第二本书——关于这次远征经历的《河上的战争》。他再次成了名人，保守党抓住机会，让他参加以工人阶级为主的兰开夏郡奥德姆选区的议员竞选。他以不大的劣势失败了，于是，他转而马上起程去南非，决定以记者的身份为《晨邮报》报道第二次布尔战争，借此来赚取可观的收入。

和往常一样，他不仅仅是一个记者。由于英国在莱迪史密斯的堡垒被布尔人围攻，丘吉尔登上了一个驶往科伦索镇侦察的装甲列车，该车装着来自莱迪史密斯之外的埃斯特科特的 150 名士兵。在坦克和其他装甲车辆还没被发明出来的时代，装甲火车就是移动军事科技的最高端产品，但是，它同时也是传统战争的一个传统产物。1899 年 11 月 15 日，布尔突击队发现了它的最大致命弱点：他们破坏了火车轨道，从而使火车出轨。

丘吉尔迅速指挥人员把出轨的车厢和依旧在轨道上的车厢拆分开来，并让火车头启动起来；但是，他和他的同伙很快被 500 多名布尔人包围

了。他们别无选择，只能投降。丘吉尔被囚禁在一个由学校改装成的位于德兰士瓦省省会比勒陀利亚的战俘营中。与其说他憎恨投降，不如说他憎恨被囚禁，因而他很快加入了两个囚犯同伙的越狱计划。在行动时间到了之后，他的同伙却在丘吉尔跳过监狱围墙并跑向夜幕中时，依然留在了围墙的里面。

第二天，他爬上了货运列车，成功来到一位英国煤矿经理的家里。这位煤矿经理把他藏在井筒底下，直到三天后一列货运列车到达。该列车的一节车厢装着羊毛，开往当时葡萄牙的一个殖民地莫桑比克。列车工作人员把丘吉尔藏在羊毛包中间，并在去港口小镇洛伦索 - 马贵斯（马普托）的漫长途中成功避开了众多布尔巡视员的侦查。在该镇，他登上了一艘去英国殖民地南非德班的船，并在 12 月 23 日圣诞夜的前夕到达该地。

他怀着非常喜悦的心情参加了对曾经囚禁过他的比勒陀利亚战俘营的解放行动。接着，他在德瓦特经历了一次死里逃生的事故：他的马由于受到密集枪火的恐吓，没等他上马就向前飞奔，最后幸好一名士兵把他拉上了自己的战马。这匹马被一颗爆炸子弹射中，在承载着两个人的重量疾驰的情况下迅速流血，不过仍然支撑着把他们俩送到安全地带。第二次生死经历发生在他从比勒陀利亚乘坐另一列装甲列车去开普敦的时候。和第一次坐列车的经历一样，他们被敌人伏击，其中包括大炮的轰炸。这次，丘吉尔责无旁贷地指挥列车上的士兵成功击退了来犯的敌人。

在回英国途中，在他的生花妙笔下，一本新书《从伦敦到莱迪史密斯》很快出世，为他赚取了一笔不菲的报酬。1900 年，他再次参加议会选举，这一次他获得了一个席位，并于 1901 年 2 月入职。他作为一名杰出的演讲家很快赢得了声誉，但与此同时，他在 1904 年的脱党行为同样颇受非议：丘吉尔支持自由贸易，但保守党持反对立场，因而他从保守党脱离，加入了自由党。自由党非常欢迎这位有名的皈依者。于是，丘吉尔很快被提升为殖民地事务部次官，并在 1908 年晋升为商务大臣，进